

清史研究丛书

戊戌思潮 纵横论

吴廷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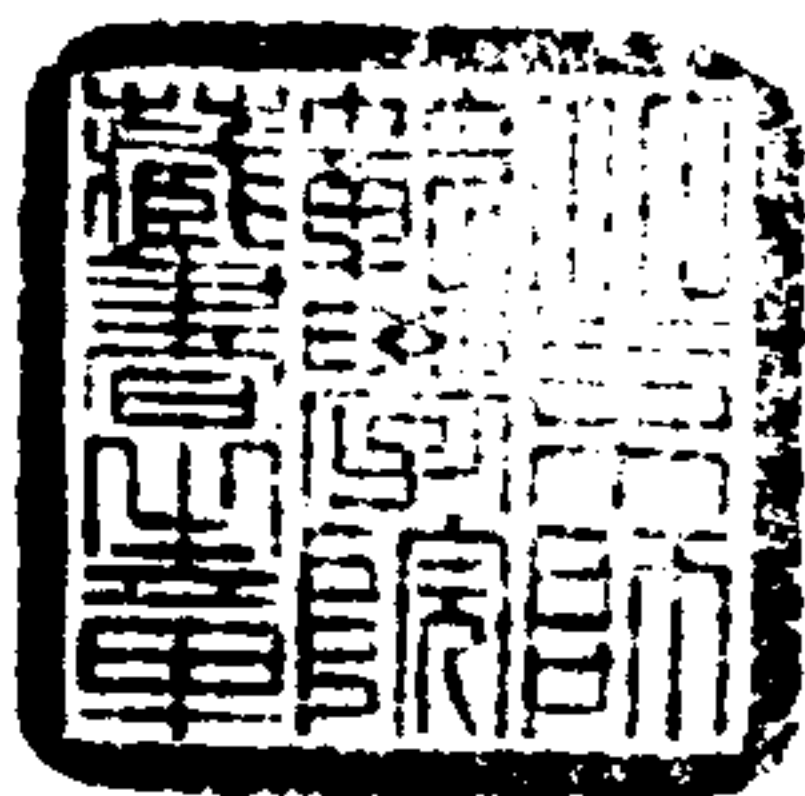


清史研究丛书

戊戌思潮 纵横论

吴廷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8700

1188700

清史研究丛书

戊戌思潮纵横论

吴廷嘉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5.75插页4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2 000 1—3 000

ISBN 7 - 300 - 00285 - 4

K·30 定价: 4.35元

序 言

戴 逸

《清史研究丛书》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高兴的一件事。这套丛书以推动清史的研究和写作为主旨，希望能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尽一点力量。

清史是个辽阔宽广的研究领域，上起十六世纪末满族的崛起，下至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逊位。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问题繁多。离我们今天的时间较近，与现实息息相关，研究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这三百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日益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巩固，文化事业兴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如果拿中国封建末期的成就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历史作比较，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国势凌替，危机四伏，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前赴后继，斗争绵延不绝，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

制。人民冲破了黑暗，历史微露出晨曦，迎来了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经过了由盛转衰、由衰而复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中国已经从沉睡的酣梦中苏醒，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正在大踏步前进。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四化的重任落在我们及以下几代人的肩上，必需团结一致、努力不懈，长期奋斗，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青春。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们为了改造现实而迈步前进的时候，经常会回顾全民族刚刚走过的路程，从中汲取力量，获致教益。人类有回忆往事的爱好、有总结过去的习性、有从自身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的潜力，有寻根的愿望，这是推动人们进步的力量。谁忘记了过去，谁就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而谁更多地理解过去，谁就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迎接和建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史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为了掌握中国的国情，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需在漫长广阔的历史领域中艰苦探索，观其大局，提其纲领，揭其规律；又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踏实钻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索隐探微，释疑扶奥，做认真细致的整理和剖析工作，即是把综合和分析结合起来，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清代三百年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档案、官书、文集、方志、野史、笔记、传记、谱牒、契据、报刊，种类繁多，数量浩瀚。汉文以外还有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和外文资料。任何才人智士，穷毕

生之力也只能在浩浩茫茫的清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中窥其一角，要凭藉这样繁多而杂乱的历史资料来展现漫长的清代历史画卷，这既给研究者充分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要求全体研究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潜心沉思、锲而不舍，把毕生精力奉献于钻研和阐扬祖国历史的壮丽事业。

尽管近年来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质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提高。但它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起步较晚，清史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薄弱的部分急需填补和加强，研究工作者只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必能得到丰厚的收获。《清史研究丛书》将为一切研究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这片园地将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成为绚丽多彩的盛大花园。

12-15333

目 录

第一章	戊戌思潮的兴起和过程	(1)
一	甲午阴霾与戊戌风云	(1)
二	狂飚初起的几个阶段	(11)
三	复苏后的黄金时期	(19)
四	戊戌思潮的衰落及其与戊戌变法的关系	(37)
第二章	戊戌思潮形成的条件与思想渊源	(41)
一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	(41)
二	明代中叶以来士大夫民主思想的萌芽及其演变	(49)
三	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与西学东渐	(69)
四	其它社会条件与列强政策	(81)
第三章	戊戌思潮的性质和特点	(87)
一	继承与批判	(87)
二	维新救亡运动的主脉络及其多重性质	(95)
三	戊戌思潮的整体特点	(109)
第四章	中西启蒙思潮之比较	(127)
一	何其相似乃尔	(127)
二	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	(138)

第五章	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	(161)
一	中日维新运动之异同	(161)
二	产生上述异同的社会历史根源	(178)
三	两国启蒙思潮的不同后果及其深远影响	(191)
第六章	戊戌思潮主体——维新派研究	(202)
一	维新派改良主义再评价	(202)
二	维新派的人生观与群体性格	(216)
三	维新派的内部结构与社会联系网络	(230)
第七章	戊戌思潮典型人物剖析	(243)
一	梁启超的性格与心理特征	(245)
二	张謇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258)
第八章	戊戌思潮代表作——《大同书》评析	(277)
一	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壮丽蓝图	(277)
二	反封建大合唱中的最强音	(286)
三	主要特点与时代风采	(297)
第九章	戊戌思潮时期的知识分子队伍	(305)
一	近代知识分子队伍集结的起点和社会标志	(305)
二	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和原因	(318)
三	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特点与构成	(333)
第十章	传统社会观与文化观的变革	(351)
一	传统社会观念的全面动摇与变革	(351)

二	文化观变革与中西学交锋·····	(363)
三	文艺新貌与世俗更易·····	(371)
第十一章	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	(384)
一	石破天惊的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	(385)
二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先驱·····	(393)
三	近代教育、文化、学术事业的起点·····	(403)
四	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壮大及其历史作用·····	(413)
五	晚清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420)
后 记	·····	(429)

第一章 戊戌思潮的兴起和过程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

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黄遵宪，在其《己亥杂诗》中，热烈地讴歌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社会理想。诗中表现的那种不以成败论历史、而以历史看成败的观点，相当进步。的确，戊戌变法横遭镇压，政治上成果有限；但戊戌前后以维新救亡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标志的社会思潮（以下简称“戊戌思潮”），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着一个新的开端。

一 甲午阴霾与戊戌风云

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堂堂“天朝”，竟被邻近的东方小国日本打败，“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①，不能不使举国震动。人们从夜郎自大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这次战败决非偶然，诚如蔡元培先生所说：“聚铁成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叹息。”^②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页。

②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列强通过各种政治借款,控制了中国的关税、盐税、内地税等全部财政收入,从而左右着中国的政局。它们的对华金融投资业也迅速发展,汇丰、横滨、正金银行成为英日资本代理人;法兰西银行、花旗银行、道胜银行、华比银行、荷兰银行等,也在甲午战后纷纷建立,列强财政寡头的魔手已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列强对华工业投资急剧增长,1913年以前外国在华规模较大的166家工厂,大部分在甲午后开办,其中不少是垄断性的大企业,《马关条约》准许列强在华开工厂,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和通向全国的路径。与资本输出已成为列强主要经济侵略手段的同时,商品输出继续增加。从甲午战争到19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加两倍半,外侨增加15万人,外商增加3,200家。^①20世纪初,世界性托拉斯组织英美烟草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美孚油公司等也相继侵入中国,在广大中国农村建立起它们的销售网,触角深入到边远腹地,中国被更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它对于列强,已经不仅仅具有原料和销售市场的意义,而是从流通领域直接成为其生产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附庸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了。列强对华的领土野心也随之扩大。甲午战后不久,列强以控制掠夺中国的矿产权和铁路权为中心,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割地狂潮。小农经济的传统结构受到了巨大冲击,解体的速度大大加快,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甲午战争暴露了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的黑暗腐败。以慈禧为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页。

首的后党，挪用海军军款修建颐和园，为大摆慈禧60寿辰盛典的排场而一味主和，置国难于不顾；帝党虽主战，但虚骄与爱国不分。翁同龢布署不力，调度无方。担任战争总指挥的洋务大员李鸿章深知自己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是只“纸糊的老虎”，中看不中用。^①为保存实力，他敷衍塞责，贻误战机，深得慈禧三昧。军事将领叶志超、吴大澂、卫汝贵等望风即溃；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精兵屯驻环畿左，内帑虚糜二十年”，洋务运动的练兵自强，毁于一旦。^②满清小朝廷内部的权力倾轧、派系纷争也在战争中显露无余。李鸿章叫苦不迭，称甲午战争其实是北洋海军独自同日军决战，这话几近于事实。在战争中升任步军统领的荣禄，则大骂“合肥（即李瀚章——作者注，下同）甘为小人，而常熟（即翁同龢）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③。从前线到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内部政争纷纭不息，上下莫不如此。民众对统治者的失望达于极点：“十载楚材零落尽”，“有器无敌终委人”，对“紫标黄榜多豪富，府海官山少异才”的丑恶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愤慨。^④

沉沦在社会底层的广大老百姓，是甲午战争恶果最直接的承担者。战争期间，官府乘机摊派勒索，大刮民财，以至“百姓受害实深，而公家所得无几，徒使劣幕、蠹役，坐吮其膏”。战火中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东北、山东人民，“男女老幼等逃窜流离，

① 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00页。

②④ 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0页。

③ 《中日战争》〈四〉，第576页。

道瑾相望。”^①浴血奋战的台湾人民，终于被清廷出卖，著名抗日英雄简大狮苦战年后撤退至厦门，为清官府所获，简慷慨陈辞：“我反倭，非反大清也。今为中国官吏所杀，亦复无恨。若以我予倭，则死不瞑目。当事者竟缚大狮献於倭，处极刑。”^②求为大清刀下鬼竟且不得，清廷之昏聩无能已到何种程度，也就可见一斑。

时局危急，民生多艰。甲午战后严酷的中国现实，激起了人们对统治者的莫大义愤。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探讨战败的原因。他们无情地鞭笞后党：“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同时辛辣地嘲讽帝党：“军书旁午日苍黄，常熟司农访鹤忙。从此朝廷添韵事，风流不让半闲堂（贾似道住所——作者注）。”把翁同龢比做南宋权奸贾似道。总之，“何人持算盘盘错，当局枯棋著著难”^③。对清政府的质疑和批判越演越烈，不满情绪波及社会各个阶层。1895年5月，台湾“布告泰西各国，愿为自主之邦”。10月，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大清帝国的神圣地位已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动摇。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则说明了明治维新的成功，这又不能不引起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震动。这些都启示人们逐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和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进步。战时一位佚名作者编辑的《绘图扫荡倭寇纪要初集》，虽有爱国热情，但还不明世界形势，视日本为“蕞尔岛夷”，发了不少狂言空论，充满

① 《中日战争》〈四〉，第578、167页。

② 《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6页。

③ 同上书，第31、16、47页。

虚妄自大之气。到1895年寄啸山房主人编辑的《时事新编》（六卷）所汇集的文章，如《纵论中倭大势》、《愤言》、《防倭论》等篇，就已经从中日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清朝洋务运动的失败方面，论述甲午海战胜败的原因了。《申报》刊载的《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远人》一文，则发出“中国故大有人在，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我民不可玩”^①的议论，表明人们开始相信“我民”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必须靠自己起来斗争。此时，已开始兴起民族自救的浪潮！

探寻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必然促使人们对洋务派所搞的以富国强兵为招牌的洋务运动进行历史的总结。于是，洋务运动的得失成败及其根源，成了社会的中心议题。人们批判洋务派的改革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于“整顿之法，救弊之方”懵然无知，但为“享富贵、贻子孙之计”。^②杰出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于1895年拍案而起，痛责洋务派的改革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实为“自许豪杰”的“趋时者流”，“徒剽窃外洋之疑似，以瞞主上之聪明。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才亟，则可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居间而自润”，借机谋私。^③一时间，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纷飞，连张之洞也电奏清帝，指斥李之“昏迷”，李的侄女婿张佩纶则说李“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致使“四十年之勋名威望，一旦

① 光绪21年闰5月23日《申报》，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

② 《中日甲午战争文学集》，第479、490页。

③ 《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5、31—32页。

为倭约丧尽”^①；著名京剧艺人赶三在北京舞台上借《鸿鸾禧》剧中人物丐头之口，讥讽李鸿章“剥去黄马褂，拔去之眼翎”^②；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的呈文甚至说，对李“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应请立加罢斥，以儆奸邪”^③。这些认识，固有其历史的局限，未必科学和全面，但它却是一个信号，表明新的社会思潮已经突破了洋务思想的局限。

甲午战争失败的无情事实，迫使更多的人不得不去了解“近日列国情事”^④，从而睁开眼看世界，承认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感觉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谭嗣同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终此创痛巨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从而酷嗜西学。^⑤严复自此“致力于译述以警世”^⑥。当时印行的黄庆澄的《榴觞间语》、养吾氏的《湖上问答》、蜚叟的《蜚炎七篇》，及其他许多文章、文集，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这说明学习西方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课题。

外国投资的刺激，新式企业优厚利润的吸引，中国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这些因素都促进着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甲午战争失败，也使部分人从中日对比中看到经济变革的重要性，立

① 《中日战争》〈五〉，第229、230页。

②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九。

③ 《中日战争》〈四〉，第71页。

④ 《中日战争》〈四〉，第22页。

⑤ 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见《戊戌变法》〈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

⑥ 同上书，第183页。

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及第的张謇，就在“自溺于贱业”的矛盾心理中，着手筹办大通纱厂，其重要动因之一，就在于“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危迫……想到日本是一个小国，何以反走到中国前面去？……因此就推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救醒他起来，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样办法”^①。另两位状元出身的孙家鼐、陆润庠也于甲午后投资办厂。1894——1902年间，民族工业资本迅速发展。除1901年投资额为38万元以外，其余几年都在300万元以上，1899年高达794万元，9年间投资总额为3720多万元，新开厂矿110个；而1872——1893年22年投资总额仅1700多万元，厂矿总数66个。^②这正是戊戌维新前后启蒙救亡社会运动赖以兴起的经济基础。不过，作为社会思潮，它总是以历史遗产为材料，以现实为契机，以未来为目标。它并不直接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也往往不同经济发展的程度绝对地成正比。在民族危机、世界局势、西方文化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这个思潮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已经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资产阶级范围内，而且代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爱国人士、进步的分子们的共同愿望。

这种要求，在统治阶级上层也引起强烈反应。如陕甘总督陶模、户部侍郎胡燏棻在1895年上的《培养人材疏》、《变法自强疏》中指出：“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亟”，要求“仿行西法”，“设立学堂以储人材”^③。于是，以康有为、

①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7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这里据93页表1有关资料推算。

③ 《变法自强疏》，见《戊戌变法》〈二〉，第269、279、283页。

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奋起承担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

1895年4月末，在北京赶考的18个省的举人，由梁启超发起，“于松筠庵会议”，共推康有为主其事，草疏18000余字，集众1300多人，于5月2日（光绪廿一年四月八日）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公开向朝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这份由康有为起草的请愿书（即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引起了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动。它“遍传都下，士气愤涌”^①，连川、贵、甘等省也各有数十人参加，左都御史裕德惊呼：“人心惴惶，于此可见。”^②

“公车上书”是受延续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欺压的知识分子的非常举动。这些知识分子以政治集会、公开上书请愿等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手段，向“乾纲独断”的皇权专制提出了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这显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萌芽的性质。这个事件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作——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③，已不再拘泥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忠奸之争，也不再局限于中日之间战或和的利弊之争，而是鲜明地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指出“变法成天下之治”，才是“治本”的“立国自强之策”。上书还附有富国、兴农、改革教育和官制等一整套具体措施，强调“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第130页。

② 《中日战争》〈四〉，第54页。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写于1888年，因大臣扣押未能呈交光绪。该书已初步孕育了其后的变法思想，但远未明确，更未成熟。